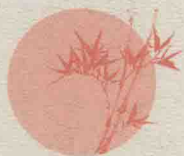




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明词史(修订本)

张仲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明词史

(修订本)

张仲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词史/张仲谋著. —2 版 (修订本).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ISBN 978-7-02-010550-2

I. ①明… II. ①张… III. ①词 (文学) —词曲史—中国—明代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0554 号

责任编辑 于 涛 葛云波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5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7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50-2
定 价 45.00 元

序

己卯夏仲，仲谋索序其《明词史》，因循未报，转晴两阅春秋。仲谋从学三年间，相与话题至多，独少谈词，明词尤未论及。然则别去不二年，其撰朱明一代词史竟成。不能无感，复亦不知从何说起。

仲谋涉猎称广，而于宋代诗文词则缘授课故，积累似尤夥。我则近二十年来冷蠹茧守，每为高明所不为之事，沿借刻下新话语，即枯坐自处边缘化境地。是故仲谋亦择治清人诗为攻读学位之课题自饴，且以先进为同门所折服，旋踵继以清诗群体之攻研。长夜反思，不禁抱疚：导率从学诸君不趋事主流究讨，踟蹰冷题，市场逼仄，不啻误尽各位生机。所幸去岗日已不远，谅可淡散影响。不意仲谋出余力别治明词以补备词史，无惮冷嫌，殆如慰供不佞聊可略宽抱疚心。

虽然，或有说焉。文学史事之研究，贵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而按之学术生涯，原乃持志寂寂冷窗前事。世多谓文学史实心灵史之一种，唯心灵也者自必涵及心志、心智、心性、心气以至于心术种种。才士代出，一代有一代之心魂，然若以心术言，则唐宋之后术势加重，文士心灵亦较之前昔转见杂沓。是故梳理之、辨析之、整合之，势尤耗心力，于明代文史之研则更甚。此中辛劳，窃以为远非清玩赏悦锈绿之骨董美所能比并，然其苦中之甘饴，或亦唯学人得能独味。仲谋撰《明词史》抑亦出乎此种心智耶？聊充序。

严迪昌 于辛巳夏初

修订本自序

从1997年开始投入明词研究,转眼十七八年时间过去了。《明词史》于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又先后完成了《明代词学通论》(2012年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中华书局2013年版)和《明代词学编年史》(与王靖懿合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作为词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和年轻的同仁们一起推动着明词研究的发展,我为此而感到欣慰。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重写文学史”之说。假如把清人关于明词粗枝大叶而又例作贬语的零散说法看作明词史建构的起点,《明词史》在作相关学术清理时也确有补偏纠谬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明词史》也有一点“重写”或“重构”的意味。但从根本上来说,《明词史》不是“重写”,而是“补写”,是在唐宋词研究已到精耕细作地步、清词研究亦有相当成就的背景下,筚路蓝缕,开辟榛芜,为千年词史补上了一个缺略的环节。从文献资料条件来看,早在十五年前,既没有《全明词》,也没有《全明词补编》,仅凭一部《明词汇刊》,就敢率尔操觚来写《明词史》,也确实有点大胆冒进了。然而词学界的前辈与同仁对《明词史》资料方面的缺失表现了最大程度的宽容,并且对该书开拓明词研究领域的客观效果给于充分肯定,所以《明词史》才能于2008年荣获第四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因为事属草创,我对明词史框架体系的建构一直不无隐忧,惟恐因自己提出的“未定之论”对后人构成误导。在《明词史》问世之前,学术界关于明词与明代词学知之甚少。明清以来虽有一些“碎

片式”的认识,比如说,关于刘基、杨慎、王世贞、陈子龙等重要词人的评点,但是没有史的线索与分期框架,甚至没有整体的基本判断。我这样说,不是想张扬夸大自己对于明词史的建构之功,相反,我是对自己凭空建构的明词史框架以及一些基本提法能否经得起后人的推敲充满忧思。像唐诗、宋词那样久经评鹭,早已是尘埃落定,当然会让研究者有更无开拓余地的苦闷,但像明词这样几乎毫无研究基础,也会让人如行走在四望空阔的大漠上,一方面是仿佛可以一空依傍,哪里都是路,但同时也让人担心,不知自己踏出的路径能否为后人所认可。先师严迪昌先生曾经不止一次提到清代诗人江湜(弢叔)诗风的评价问题。与江弢叔同时或稍后的诗人皆称其诗学昌黎、山谷,而钱锺书先生细读其《伏敌堂集》,乃称其诗实出于杨诚斋。试想黄山谷之于杨诚斋,一个是瘦硬欹侧,一个是流易清新,其诗法家数几于南辕北辙。钱锺书先生说:“至作诗学诚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唯有江弢叔。张南湖若见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敌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①我读到这一段话时便惕然自警:因为《明词史》是第一部关于明词的著作,如果该书还有一些创立之说,应多属于“未定之论”,必须经过几代学人的推敲品鉴、丰富补充、整合提炼,才可能逐步成为约定俗成之定论;当然也会有一些说法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因此会为学界新说推翻、否定或取代。这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作为探路者,我会坦然地接受后来者的指点评说。我只是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尝试提出的说法,对新踏入明词研究的青年学者形成遮蔽或误导。清人心气高,眼孔大,觑明人如草芥,故往往放言高论,嗤点明人,而我们这一辈人因为有了更好的文献条件,又对明词作了较为系

^①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页。按:严迪昌所引当为《谈艺录》旧版,1984年版与此文字小异。

统的逼近考察,所以敢于推翻如朱彝尊、陈廷焯等清代词学家的说法。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想来若干年后,《明词史》的粗疏与浅薄都会是显而易见的吧!

本次再版虽然只是修订增补,还是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增删相抵,全书增加了大约十万字的篇幅;而保留的部分经过覆核与验证,亦耗费了不少时日。总起来看,这一次增订,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根据近年来先后问世的《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以及一批辑佚考证的论文,补写了一些群体、流派和若干词人。如“由元入明的遗民词人群体”、“晚明艳词派”和“早期柳洲词派”,以及周履靖、俞彦、柳如是与黄媛贞、黄媛介姐妹等词人,都是这一次增补进来的。二,对书中引录的 300 多首词作了全面的校订。初版本中录词固多舛误,此次着意校订,才发现明词的版本问题实在是一个不容轻忽的大问题。王昶的《明词综》擅改原作之处甚多,叶晔博士已作具体考证,而今的《全明词》在版本选择与文字校对两方面均颇粗疏,文字讹误层出不穷。衍文之例如杨荣《满庭芳》“不妨对、绮席琼筵”,“席”字后衍一“度”字(1/214);阙文之例如任环《长相思》“别君难”后漏“见君难”三字(3/1052);因形近而误者如王达《喜迁莺》“马蹄踏冻”之“蹄”误作“啼”(1/216),茅维《十赉堂丙集》“丙”误作“内”(3/1301),吴骥《唐多令》“却笑青松缘底事”,“缘”误作“绿”(3/1520),万维檀之“檀”误作“擅”(5/2734),如著名曲家金鸾的别集《萧爽斋乐府》前三字误作“箫夹齐”(2/474)。据平时阅读随手标注,《全明词》中的文字讹误已不下百例,乃知《全明词》可参考而不足为据。三,根据这十多年来个人的学术积累,同时也吸取借鉴同仁的研究成果,对原书中存在的一些讹误之处作了修正。原书中有些资料出于转引,文字亦有舛误之处。虽则曰成书仓卒,实际是个人文献意识淡薄的表现。经过此番校订,总的感觉是原有的疏误稍得订补,但限于时间与精力,也没有作太大的更张。

仍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未能作深入探讨,或者说是停留在心向往之而未至的境界。比如,关于明词特色问题。年轻而睿智的余意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词学之建构》中就曾指出:《明词史》绪论中提出,应走出以宋词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以后词人的思维误区,“以宽容心态对待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云云,实际在《明词史》中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所谓明词的“异量之美”是什么样子,并没有得到正面揭示或描述。这是非常切中肯綮的批评。事实上,在这次修订时,我也只是在绪论中增加了“关于明词特色问题”一节,对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大学术难度的课题作了粗线条的勾勒,算是对余意博士批评的一种回应。我在平时给研究生上《明清词学研究》课的时候,因为可以结合具体词人词作,从容地擘划分说,所以关于明词特色,听课诸生或可得到一些感性认识。但那种即兴散漫或具体而微的讲说方式并不适合文学史的叙述体例。我对叶嘉莹先生的论词著作浸淫日久而受益良多,但她那种从容不迫、细致入微的学术风度和文章风格我却一直没能学来。同时也应该承认,我对明词特色的认知与提炼,亦未能达到了然于心、精当不可移易的程度。我期望余意博士的新著《明代词史》对这一课题展开接力式的持续攻关,从而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进步。

先师严迪昌先生为《明词史》所作序,文短情长,其中的感慨也许只有我们这些及门弟子才能解读感悟。先生赋性敏感而倔强,特定历史条件与个人遭际相乘除,使之形成疏离抗争的心态与野逸孤峭的个性。这种个性同时也投射在他的《清诗史》、《清词史》诸书中。他论诗不喜“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渔洋,不喜“善仰圣意”的沈归愚,而对布衣寒士等草野诗群,尤其是对坎壈失志、数奇不偶者如赵执信、黄仲则、龚自珍等人则不吝同情与赞赏。所以读先生的书,可以从中感知其风骨与性情。在先生为本书作序的2001年夏初,他的身体已经日渐消瘦了。吴熊和先生曾不止一次

对我说：你要让你先生到医院去查一下，他这么消瘦下来，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严先生一直在忙，先是修订那部卷帙厚重的《清诗史》，然后是写那部极富创意而未能最终完成的《清代文学史案》，还有一些大块文章。及至 2003 年确诊病症，已经是回天无力了。现在重读此序，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事实上幽明殊隔，不闻先生警欬亦已十年有余了。

本书责任编辑葛云波同志为此书的审读校核花了很多精力，在文献查考以及标点注引等技术性细节方面尤多是正之处；后转由于涛博士作责任编辑，亦仔细通读全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返给我的稿本上，丹铅满眼，纸条纷纭，一望可知其花费了不少心力。遵照他们的建议，我又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修订打磨，虽不敢奢望精品境界，但自己亦感觉有很大提升。两位年轻学者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眼光令人感佩，谨于此一并致谢！

张仲谋

甲午岁暮于南京

目 录

序	严迪昌 1
修订本自序	2
绪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价值	1
第一章 明词总论	6
第一节 明词中衰的历史原因	6
第二节 关于明词曲化的认识	15
第三节 明词的发展与分期	19
第四节 关于明词特色	21
第二章 风云激荡的明初词坛	29
第一节 由元入明的遗民词人:谢应芳、倪瓒、邵亨贞、 陶宗仪、王逢	32
第二节 刘基《写情集》:志深笔长、慷慨任气	48
第三节 杨基《眉庵词》:清新雅令、俊逸风流	59
第四节 高启《扣舷集》:信笔写去、别有高境	67
第五节 张肯《梦庵词》:远绍姜张、律吕协洽	73
第六节 瞿佑《乐府遗音》:明词曲化之先声	79
第七节 明初其他词人:张以宁、魏观、贝琼、王行、刘炳	91
第八节 林鸿与张红桥故事辨证	99

第三章 明词的衰蔽期	104
第一节 词中台阁体	106
第二节 词中打油体	111
第三节 词中理学体	115
第四节 马洪:词坛荒漠中的小名家	121
第五节 其他词人:王直、聂大年、吴宽、史鉴、李东阳、 桑悦	126
第四章 明词的中兴期	139
第一节 “一代词宗”杨慎	141
第二节 “豪迈激越,犹有苏辛遗范”的陈霆	153
第三节 词曲兼擅的陈铎	164
第四节 追步秦观的张綖	172
第五章 明代后期词坛	210
第一节 王世贞:文坛领袖、词坛票友	215
第二节 专家型词人俞彦	224
第三节 “以宋人为主臬”的茅维词	228
第四节 被遗忘的词家易震吉	232
第六章 晚明艳词派	263
第一节 浓艳而刻入的吴鼎芳	266
第二节 幽柔香弱的顾同应	270
第三节 专主性情的董斯张	273
第四节 花影浪仙施绍莘	276
第五节 香丽蕊僧单恂	282
第七章 明代女性词人	286
第一节 丛簇东南的女词人群体	287
第二节 沈宜修及其家族中的女性词人:叶纨纨、 叶小纨、叶小鸾、张倩倩	291
第三节 黄媛贞、黄媛介姐妹	300

第四节	其他闺秀词人:王凤娴、徐媛、商景兰、商景徽、 王静淑、王端淑、吴绡	305
第五节	青楼词人:王微、杨宛、郑如英、柳如是	320
第八章	前期柳洲词派	330
第一节	柳洲词派的形成	331
第二节	早期柳洲词派中坚王屋	334
第三节	钱继章及其家族词人	340
第四节	吴熙(亮中)《非水居词笺》	346
第五节	曹尔堪及其《未有居词笺》	350
第九章	明词的辉煌终结	355
第一节	陈子龙:洗尽铅华、独标清丽	358
第二节	其他英烈词人:孙承宗、吴易、张煌言、汤传楹、 夏完淳	370
第三节	明季二陆	384
第十章	明代词学的建构	394
第一节	明代词谱的创建	394
第二节	明代词论的发展	411
第三节	明代词选的贡献	423
附录一	明词总集(含选本、丛刻)述要	429
附录二	明词别集叙录	456
附录三	明代话本小说中用词情况考论	485
征引书目		507
后 记		521

绪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价值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论“当代”词，已经自惭形秽，清代诸家词话提到明词，更差不多都是贬抑否定之词。300多年来，为明词发覆表微之举，一为清代嘉庆年间王昶辑刻的《明词综》，一为近人赵尊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辑刻的《明词汇刊》。二十世纪出版的数十种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从未论及明词。专体史如刘毓盘《词史》第9章《论明人词之不振》所给篇幅极少^①；王易《词曲史》则称明代为“入病”，而清代为“振衰”^②，鄙薄明词之意显然。自1980年代以来，不仅唐宋词研究几成“显学”，清词研究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而明词研究直到世纪之交才开始起步。虽然近年来取得一些成绩，但开拓空间还是很大的。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的价值意义，从词学本体的观点来看，应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从明词自身情况来看，尽管我们承认明代是词史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这种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明词的理由。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明词》，卷首“出版说明”中云：“共得词家一千三百九十余人，词作约两万首。”2007年，周明初、叶晔编著的《全明词补编》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记》中云：“这部补编所收词人达六二九人，词作五〇二一首（含存疑词五十首，残词或句七则），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四七一人之词作三〇七六

① 刘毓盘《词史》第9章，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王易《词曲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首,已收词人一五九人之词作一九四五首。”再加上近年来数量至夥的增补辑佚文章所收,明代词人总数已达1900余人,词作26000余首。根据前代总集的编辑规律来看,应该说明代词人词作的数量还未见底。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数量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一代才人抛掷心力于此,其间不可能全无佳作。从明初的刘基、高启、杨基、瞿佑,明代中期的陈霆、陈铎、夏言、杨慎、张弼,以及稍后的王世贞,一直到明末的俞彦、易震吉、王屋、陈子龙等,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足以证明“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可信的。历来贬抑明词的人总不免陷入一个误区,即以宋词体现出来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以后的词人,以似宋人或不似宋人的类比思路排斥一切与宋词异趣的作品。走出这种思维误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明词还是不容简单否定的。

其次,从中国千年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无可置疑地是其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缺了它,中国词史也就丧失了连续性和完整性。明代前后长达270余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时间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乱世之更叠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对上而言,它是宋元词的一脉相传;对下而言,它是清词中兴的前提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千年词史的整体性考虑,还是要为宋元词尤其是清词提供“上下文”背景,明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像李攀龙那样在一部《古今诗删》里删去整个宋诗,把明诗直接唐诗,作为文人的别择偏嗜来看也许无可厚非,但作为学者来说就未免太偏激了。

以上两点都是“常识”层面的道理,毋庸辞费。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相对于明代其他文体或明代文学之整体研究来说,明词至今仍是一个未经开采的资料渊藪。一般人总以为词既非叙事文体,又不像诗那样较多地反映创作主体的经历,所以对其资料价值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实正如有水必有鱼,有土地必有矿藏,宋代以来之词,已并非都是“空中语”,从非词本体的角度来读明词,更

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关于词人的生平行状,明词中即不乏可资考证的资料。如明初的杨基,《明史》本传载其洪武初年曾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不久即以省臣得罪去职,洪武六年(1373)又起奉使湖广。而《眉庵词》中有《贺新郎·句曲闲居春暮》一词,小序云:“自离西江省幕谪句曲,已徂春矣,寓居无聊,未免感时抚事,爰填古词,用拨新闷云。”可知其不仅是落职闲居,而是被谪句曲,时间约在洪武五年(1372)。即此便可补其仕履之阙。又如明代中期的陈霆,过去只知道他生活在弘治、正德间,其生年历来无载,然而其《渚山堂词》中有《水调歌头·己卯初度》一首,中有“早是年开五秩”之语。己卯当为正德十四年(1519)。旧以10年为一秩,五秩即50岁,41岁为50岁纪数之始,故知陈霆己卯年为41岁。白居易《长庆集》卷71《喜老自嘲》诗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开八秩即71岁。据此推算,陈霆当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

关于其他文体的考证,明词中亦不乏有用的资料,如明初瞿佑有一首《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

争地图王,地老天荒,至今未休。记东都已覆,聊迁许下;
西川未举,暂借荆州。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生子当如孙仲谋。
三分鼎,问谁能染指,孰可同舟? 一时人物风流。算忠
义,何人如武侯。看文章二表,心惟佐汉;纵横八阵,志在兴
刘。底事陈生,为人乞米,却把先公佳传酬?千年后,有新安直
笔,正统尊周。

也许是研究小说者与研究诗词者“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结果,这原本该引起小说研究者浓厚兴趣的词作,过去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词题中所提到的《三国志》,肯定不是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而应是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人称小说《三国演义》为《三国志》是常见现象,称全名倒是少见。如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

义序》云：“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①而北京图书馆所藏《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明代刻本，书名就叫《新刻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词歇拍处。陈寿著《三国志》，《魏书》前四卷称纪，对魏的君主称帝，叙入纪中。《蜀书》、《吴书》有传无纪，对蜀、吴君主则只称主，叙入传中。这种叙述体例表明陈寿是尊曹魏为正统的。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史书《三国志》最大的区别，就是尊蜀汉为正统。“正统尊周”是比喻性说法，以三国时期比战国，而以蜀汉为正统。从陈寿所处的晋代向后推一千年，正当元明之际。这些都表明，这首词不是一般意义的咏史之作，而应是对当时问世不久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评论。那么，它对于《三国演义》研究有何意义呢？首先，它出自明初的瞿佑之手，这就自然否定了《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的说法。其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及作者籍贯一直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有新安直笔”一句，也为考证作者或作者籍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或佐证。推而广之，如果有人愿意从《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乃至《全清词》系列中去搜辑小说、戏曲资料，一定会有一些超出传统或习见资料的创获。

明词作为文学之一体，亦可为研究文学艺术思潮提供别类佐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方面是不同的文体各有其艺术个性与独特的表现功能，另一方面是不同的文体因共时并存而具有某些共同或相通的时代特征。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分工太细，文体间壁垒太严，所谓“各照一隅，鲜观衢路”，对这种共同性的认识是不够的。如明代前期的“台阁体”，过去一般只把它看成诗文流派，其实词中亦有“台阁体”。而且不是另有一班人马，而是由杨士奇、杨荣及朱有燬等人构成的台阁文臣群体对各种文体的全面渗透与制控。当然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师承。台阁体诗取法盛唐，尤其是

① 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李、杜；台阁体文主要学北宋，尤其是欧阳修；而台阁体词则主要规仿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主要特征是设色富丽，节奏安和，铺陈祥瑞，歌时颂圣。词人于不胜惶恐中夹着做作夸张的激动，以及感恩图报的效忠之词，读来一片祥云瑞气，却又空无一物。与宋代大晟词人的作品相比，这些词的台阁气味更浓，然而也更不像词了。也许，只有把包括词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都纳入视野，文学史与文艺思潮史才能呈现为完整立体的宏富景观。

总之，一方面是明词自有其不可轻忽的价值，另一方面，明词自身的价值也不可等同于它的词史价值与研究价值。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避冷趋热、避难就易是一种常见现象。然而，随着研究层面的不断拓展，明词的研究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当然，在基础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各种条件尚不十分具备的情况下，就试图写出一部明词史来，粗浅与疏漏之处是在所难免的。但这种开辟榛芜的草创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明词史上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书也不敢奢望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能作为一个开端，一个基础，为正在全面展开的明代词学研究起到一点铺垫作用。

愿如所祈！